

本書榮獲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ますぎ しずえ

真杉靜枝 與

殖民地台灣

生於日本長於日治期的台灣

真杉靜枝

始終擺盪於

美麗島與敷島兩個故鄉之間

既是過客也是歸人

吳佩珍

目次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i

序章

1

第一部 「私」小說與「私小說」書寫

第一章 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與「台灣」記號的反覆：論〈女兒〉、〈某個女性的生平〉及其

衍生文本

第二章 殖民史？羅曼史？：殖民地台灣與武者小路實篤、真杉靜枝、中村地平的文學交涉

23

第二部 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

第三章	言與不言之間：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的書寫與台灣.....	85
第四章	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	107
第五章	台灣皇民化時期官方宣傳的建構與虛實：論真杉靜枝「沙韻之鐘」翻案作品.....	125
第二部	帝國與帝國之間	
第六章	鄉關何處？：真杉靜枝「花樟物語」的台灣再現與變化.....	153
第七章	日本帝國崩壞與美國霸權君臨：以真杉靜枝戰後書寫（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代）為中心.....	173
結章	207
真杉靜枝年譜	211
後記	213
參考文獻	217

序章

真杉靜枝一九〇〇年（戶籍資料爲一九〇一年）¹生於日本福井縣，是父親真杉千里與母親黑川密伊（みつい）婚前的「非婚生子女」。根據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某女流作家之愛與悲傷的生涯》敘述，真杉千里在明治三十年由福井師範學校畢業，至真栗的清水小學任教時，結識黑川密伊。當時真杉千里已有內緣關係的妻子，但卻讓黑川密伊懷了真杉靜枝。真杉千里不願雙親反對，離開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內緣妻，在真杉靜枝出生之後才與密伊正式結婚。不僅如此，更因爲真杉家族在德川幕府時期原爲福井藩士，而密伊是商家的女兒，因身分階級不同而讓真杉的母親受到夫家的排斥。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杉千里決定與妻兒遠渡台灣展開新生活，真杉靜枝之後也隨父母赴台。抵達台灣之後，

1 即使真杉靜枝出生，真山千里與密伊的婚事仍遭到真杉千里父母反對，直到真杉靜枝出生第二年才完成戶籍登記，真杉千里才能爲真杉靜枝辦理出生證明。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某女流作家之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頁三〇。

真杉千里起初擔任學校教師，後轉任神社神官²。根據筆者調查發現，真杉千里最早在台灣發表的文章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關於台灣的神社(上)(下)〉(台灣における神社に就いて)，主要主張台灣神祇史要如何開拓整理。自文章內容推敲可知，其當時已經開始擔任神官。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南麻豆的曾文神社落成，便開始擔任此神社神官，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九三九年真杉靜枝偕同中村地平訪台，真杉在此時期的小說以及隨筆中提及的台灣家中神社，應該就是曾文神社³。

2 真杉千里在台灣原本於台中附近「胡爐屯」擔任中學教師，但真杉靜枝從夫家逃婚到大阪之後，與武者小路實篤陷入「不倫戀」，這個醜聞不僅在日本文壇、甚至在當時狹隘的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社會，都掀起了軒然大波。真杉千里因而被迫辭去教職，之後轉任神社神官。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台灣—「むすめ」と「ながれ」から〉，《天理台灣研究会年報》四(一九九五)指出，一九三八年發行的《台灣總督府職員錄》中，曾文神社的項目記載著真杉千里的名字。真杉靜枝的傳記小說〈女兒〉(むすめ)，《新潮》(一九四〇年五月)也提到：「梶子〔註：以真杉靜枝為藍本的女主人公〕的家人在梶子離家後，便離開中部搬至南部，在中部擔任學校教師的父親，現在則在南部擔任神社的神主。」十津川光子提及真杉千里「成為台北附近曾文神社神官的千里」中的「台北」應是「台南」之誤。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頁三〇—三三。

3 參照本書第一章〈女兒〉的分析。曾文神社的籌設到落成，請參照《台灣日日新報》，〈舉郡一致・麻豆街に曾文神社を建立國民精神の作興に資すべ工夫は七萬圓程度〉(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以及《台灣日日新報》，〈曾文神社鎮座祭十九日盛大に執行〉(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等相關報導。而真杉千里在《台灣日日新報》除了本文所介紹的神職相關文章之外，也有漢詩作品。此外，他也在台灣神職會出版雜誌《敬慎》投稿相關文章。據筆者調查，真杉千里在《敬慎》最早的文章為〈如何にして神社の意義を徹底せしむべきか〉，《敬慎》第二卷第一號(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直到最晚期的〈潮櫻餘音〉，《敬慎》(一九四二年四月)為止，刊載於《敬慎》的文章共計十二篇。

真杉靜枝十一歲時，因父親在台灣罹患風土病，一度舉家遷回千里的鄉里福井縣。在此地的小學校度過兩個學期之後，正當舉家預備再次渡台，祖父突然腦溢血過世。處理完祖父後事並安頓祖母的生活之後，由於當時密伊已懷有身孕，真杉因此與母親一起回到大阪的娘家，之後再次渡台與父親會合⁴。十八歲左右她在父母安排之下結婚，但由於無法忍受受父母之命所安排的婚姻生活，之後便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外祖父母。爾後進入大阪每日新聞擔任記者，因工作上採訪的關係結識武者小路實篤，進而開始從事寫作，登上日本文壇，是少數經歷殖民地台灣生活並且以此經驗做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武者小路是真杉在文學以及繪畫藝術的啟蒙恩師，她登上日本文壇的契機，可說是拜武者小路實篤之賜。兩人的戀愛關係雖僅止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前後，武者與真杉在文學上的交涉往來，卻一直持續至真杉逝世之前。除了武者小路之外，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的戀愛關係最爲人所熟知。兩人的戀愛關係，終因中村的雙親反對，而在一九三九年二人相偕訪台之後告終。一九四二年真杉與芥川賞得主中山義秀結婚，這段婚姻關係維持至一九四六年。與中山的婚姻破裂，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中山對真杉施以家庭暴力，這從真杉靜枝的「私小說」作品中可窺見。此外，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真杉靜枝長期定居台灣的父母以及妹妹一家人，成爲「引揚者」回到日本，投靠當時已定居

4 真杉靜枝在〈台灣的土地〉(台灣の土地)，《南方紀行》(一九四二)敘述：「雙親在我極幼小時便已經去了台灣，而我在十四歲左右才去了台灣。」十四歲以後到台灣，指的應該便是此次與母親再次渡台。而真杉靜枝略去了之前的台灣經驗，姑且不論是刻意或無意忽略，抹消少女時代前的殖民地台灣生活記憶，反映出其對台灣殖民地出身的劣等感。林真理子便曾提及，真杉靜枝不願人提起自己的台灣殖民地出身。參照林真理子，《女文士》(新潮社，一九九五)，頁四一。

於鎌倉的真杉，成爲她的經濟重擔。妹妹勝代因丈夫早逝，在殖民地台灣時期便已成爲未亡人，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此時勝代從戰場復員的兩個兒子與女兒也都與真杉一家同住。中山義秀前妻所留下的一男一女，戰後也自母親娘家東北返回東京。在戰後糧食狀況緊迫下，與勝代的兒女發生糾紛，也成爲真杉與中山義秀決裂的導火線。這些經過，在真杉靜枝同時期的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呈現⁵。戰後真杉靜枝爲核爆受害少女的救濟運動奔走，同時獲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聲援。這應是在文業之外，其所參與的最爲人知的社會運動。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真杉因癌症逝世於東京大學醫院小石川分院。

真杉靜枝的傳記對於真杉靜枝研究中對其形象的形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除了她自身在戰後出版的自傳小說之外，其所有相關傳記都在她死後出版。包括石川達三《花之浮草》（花の浮草）（新潮社，一九六五年）——其曾以日人移民至巴西爲題材的小說《蒼氓》獲得第一屆芥川文學獎；火野葦平《寂寞的歐洲女王》（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⁶；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某女流作家之愛與

5 一九四六年之後，真杉靜枝的父母與妹妹投靠真杉，真杉此時期所發表的一連串作品，如《出發之後》（出發の後），《文藝春秋》二五卷二號（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及《老腳之賦》（老脚の賦），《小説と読物》二卷三號（一九四七年三月），都描寫了當時家庭內部紛擾的狀況。二作之後都收入小說集《仇ごよみ》（鏡書房，一九四八）。這些作品對於真杉千里夫妻與勝代一家如何從台灣返回日本投靠真杉靜枝，以及如何導致真杉與中山義秀的婚姻破裂，都有反覆的描寫。

6 火野葦平，《寂寞的歐洲女王》（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新潮》（一九五八年一月）。火野描寫一九五三年參加愛爾蘭都柏林所舉行的世界筆會大會時，代表日本出席的真杉靜枝在會期中的行徑。此時真杉已經罹患癌症，但仍在歐美展開為期十個月的旅行。美國之行拜訪了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為日本的核爆受害少女（原爆娘）救濟運動奔走。這些核爆受害少女多因顏面嚴重受創，就業與婚姻因此受到阻

悲傷的生涯》(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以及林真理子的《女文士》。石川の《花之浮草》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以女主人公伊澤春江(真杉靜枝)的生涯始末為主題。石川達三以充滿惡意攻擊的筆調形塑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可看出其企圖以男性觀點的「性道德」標準，將真杉靜枝妖魔化。最顯著的例子，可從故事中的小說家古林篤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為有意從事寫作的女記者伊澤春江所吸引的描寫看出：「伊澤春江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有許多不潔的部分，但同樣也擁有年輕人特有的潔癖。古林不過是任意高估了春江」⁷，「對於春江這樣的女人而言，什麼樣的行為是沒有常識的？怎樣的行為可引起別人的注目？此外，如何才能讓她快樂同時滿足？……那便是情事。戀愛事件。她一生中與十個以上的男人有過戀愛關係。即使她的做法，從他人的眼中看來無論如何滑稽，她總無法擺脫這樣的愚昧。古林先生是第一個，但也只不過是十個人當中的其中之一」⁸。作者石川也藉當時記者對伊江進行以下評價：「她只不過利用古林，她就是那種女人。似乎總想著如何利用男人。那個女人所謂的魅力，不過是自我如此意識罷了。那最令人討厭。此外，又非常厚臉皮，到處跟人借錢，看來似乎也沒有什麼貞操觀念，如果有的話，不會一開始便成為古林的小

(續)

礙。真杉為救濟這些受害少女而奔走，籌措整形費用。有人接受顏面整形後重獲新生。火野的(寂寞的歐洲女王)一文，聚焦於放縱無禮、勞若無人的真杉靜枝。真杉戰後因創作需要，使用安非他命成癮，導致性格不變同時行為異常。火野葦平在此次旅行中所目擊的異常行為，便是發生如是變化之後的真杉靜枝。

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

7 石川達三，《花之浮草》(新潮社，一九七三)，頁五一。

8 同前註，頁六一。

「老婆。」⁹ 《花之浮草》出版當時，石川達三在《讀賣新聞》敘述自己的寫作動機：「我寫了那個人，是因為我覺得那特殊的人生樣式有趣。她的一生，是某種失敗人生的典型。既有魅力也有才華，也可說她曾經努力過，然而卻失敗了。原因應該歸咎於她對於任何事物都缺乏誠實與誠摯吧。對此，也不得不以否定的態度以對。批判古林偽善，那只不過是魚池之殃的結果。」¹⁰ 從石川達三的敘述可感受他的惡意攻訐，也可看出他對真杉的「偷窺趣味」。

前行研究對於這樣的描寫並非毫無批判。出生於台灣，同時曾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灣生」蜂矢宣朗指出：「總而言之，真杉靜枝的形象與《花之浮草》當中的呈現有極大的不同。當然我不認為真杉靜枝是純情惹人憐愛的女性，但《花之浮草》所描寫的惡女形象是有些過分了」¹¹。而日本女性文學研究者尾形明子則對石川達三《花之浮草》所形塑的真杉靜枝形象，提出嚴正的抗議：「我不敢相信這本評傳竟沒有遭到名譽毀損的控告，居然還幾度再版，能夠允許這樣的作品日本文學，層次之低，令我感到絕望。」¹²

稍後出版的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某女流作家之愛與悲傷的生涯》（惡評の女—ある女流

9 同前註，頁八〇。

10 石川達三，〈女流作家をモデル 放浪の半生をきびしく告発〉，《読売新聞》（朝刊）（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

11 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台灣—「むすめ」と「ながれ」から〉，《天理台灣研究会年報》四（一九九五），〈附記〉，頁一一三。

12 尾形明子，〈作家・真杉靜枝—復権のための序章—〉，《小説集 その後の幸福》，《近代女性作家精選集》四四（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一），頁六。

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則被視為替真杉靜枝形象復權的傳記。十津川對石川達三的《花之浮草》，做出如下的評價：「真杉靜枝死後十年，以她為藍本的小說《花之浮草》，宛若將靜枝纖細的手腕反綁，從天花板垂吊下來般，毫不留情。」¹³ 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透過真杉靜枝的妹妹勝代，直接採訪家屬，是從家屬視點出發的傳記。書中披露真杉的妹妹道野勝代給自己的來信，顯示這本傳記某些意義上是為真杉靜枝家屬代言，對世間流言蜚語的抗議：「家姐過世很快地已近十年了，這當中，文壇的大作家先生們寫了種種關於家姐的事，讓我非常悲傷。雖然我也聽說戴上假面的醜惡，才反倒能浮現內部的真實，是所謂赤裸裸的呈現。然而（按：家姐）真正的情感，我認為只有我才能感受。即使已經過了十年的現在，家姐的單純隨著歲月流逝越見彌新，鮮明地打動著我的心。」¹⁴ 也因此這部傳記，可說是真杉家族為了被日本文壇男性作家所「妖魔化」的真杉靜枝，提出抗議的平反之作。真杉靜枝傳記小說中出版時間較新、且最為人知的，應該是林真理子的《女文士》¹⁵。小說設定以真杉的秘書眼中的真杉靜枝形象為主軸，雖然此傳記小說也參照了真杉同時期作家的論述，但基本上不離石川達三、火野葦平等男性作家的「暴露趣味」基調，小說附錄的解說同樣不出此範疇。此解說由真杉前夫中山義秀的女弟子安西篤子執筆。她指出，林真理子的真杉靜枝傳記對真杉的評價可歸納出三點：一、真杉靜枝是美女。二、真杉體弱多病。三、雖然有高知名度，但卻沒留下業績——這樣的傳記評價，顯然未從真杉的作家身分來

13 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頁九。

14 同前註，頁十一。

15 林真理子，《女文士》（新潮社，一九九八）。

考量評斷。而中山義秀與真杉靜枝離婚後交惡，從此將真杉從自己的年譜完全抹煞一事來看，中山義秀的弟子對真杉靜枝的評價是否客觀，也有待商榷。而以上的描述證明了安西的發言具特定立場而且偏頗¹⁶。正因如此，林真理子的真杉傳記未能脫離有色眼鏡的框架，而被評論為：「即使描繪出令人同情的真杉靜枝，但卻毫無作家真杉靜枝的身影。」¹⁷除了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之外，幾乎所有真杉靜枝的相關傳記都對這位女作家給予負面評價。這樣的狀況不僅凸顯這位出身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所遭受的污名化超乎常理，各部傳記對其文業的評價幾乎可說是近乎抹殺。

真杉靜枝登上日本文壇的處女作，為一九二七年八月發表於武者小路の創刊雜誌《大調和》的自傳小說《站長的少妻》（駅長の若き妻）。此短篇小說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的婚姻生活以及在台日人共同體的黑暗面，這個主題也成為其初期台灣書寫的基調。正式進入文壇後陸續出版的小說集，包括處女小說集《小魚的心》（小魚の心）、《雛雞》（ひなどり），都受到武田泰淳等同時期日本作家的讚賞。《小魚之心》（一九三八）所收錄的〈南海的記憶〉（南海の記憶）、〈南方之墓〉（南方の墓），便是真杉台灣書寫的初期代表作品，主要在台日人共同體中的日本女性為主題。隨著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文壇的言論自由以及創作自主性實際上逐漸遭受箝制，配合國策的文學作品也日漸增多，真杉靜枝參加的「女流文學者會」也在此新體制下，被收編成為政府文化部門的一部分。此時

16 參照林真理子，《女文士》（新潮文庫，一九九八），頁三二一—三二七。真杉靜枝與中山義秀之間關係，參照本章之後的敘述以及本書第七章。

17 尾形明子，〈作家・真杉靜枝—復権のための序章—〉，《その後の幸福》《近代女性作家精選集》四四（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一）。尾形明子此文，乃針對林真理子的真杉靜枝傳記小說《女文士》做出的抗議。

期國策文學中所出現的「南進基地」台灣的形象塑造，同樣成爲眞杉靜枝此時期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之一。隨著局勢改變的台灣定位，也讓眞杉此時期的台灣描寫產生變化。《囑咐》（ことづけ，一九四一）以及《南方紀行》（一九四一）二部作品集，收錄了小說以及一九三九年訪台期間的見聞隨筆，時間正值日本推行「南進政策」，反映台灣日益重要的戰略地位。二部作品的「國策文學」色彩濃厚，主題多環繞同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即使如此，其描寫主題中心依然沿襲初期的「台灣殖民地女性」，只不過描寫對象已從在台日人共同體轉移至包括原住民的臺灣人內部社會。被貼上「國策小說」標籤的這些作品，與大部分國策小說的遭遇雷同，時至今日幾乎都爲人遺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不再是其殖民地的一部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戰後初期仍是眞杉靜枝的寫作題材。一九四六年以降發表的《花樟》（《東北文學》，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左門治與千代》（《東北文學》，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及《連理》（《女人藝術》，一九四九年一月）的「花樟物語」系列作品，依舊以台灣爲寫作題材，但其中投射於台灣的視線，已與她在一九四〇年代國策文學時期的台灣書寫大相逕庭。從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指涉日本帝國的敗北，此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寫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即日本宣布戰敗之後的七個月。眞杉的意識形態轉變之快令人詫異，不過，這也暗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牢附在眞杉靜枝一九四〇年代作品的國策文學標籤是否合宜。此外，現有研究（雖然極爲少數）對其戰時台灣書寫作品的解讀是否適切的問題，也應一併重新商榷。眞杉靜枝此時期的台灣書寫，除了以回顧個人家族史的形式，企圖與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史做連結之外，在此延長線上的主題，尚有探討來自台灣殖民地「引揚者」的作品《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一九四六）。此作品主要探討在日本戰敗、帝國崩壞後，被迫從台灣

返回日本故鄉的「引揚者」，如何在因戰爭而化為廢墟的東京求生存，以及在戰前殖民地台灣發生的糾葛如何延伸到戰後的內地。此外，還意味著戰後的再出發，回顧台灣與自己生平是自傳小說〈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一九五三年五月）¹⁸。除了台灣的題材之外，真杉靜枝也聚焦於帝國崩壞之後，自外地被迫返日的「引揚者」，其歸鄉之後的身分認同與故鄉回歸的問題，而這些作品與此時期的台灣書寫，有同時進行交互參照以及檢討的必要¹⁹。

日本戰後實質上進入了G H 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託管，正如John Dower在《擁抱敗北》（*Embracing Defeat*, 2000）所描述的戰後日本，在美軍的占領下，戰後新民主主義以及美國文化與價值觀的新風潮，快速地吹進了日本。真杉靜枝的作品對新君臨者的描寫呈現的奇妙景象，在於其幾乎無違和感，快速地擁抱美國文化。然而即便如此，卻絕非毫無批判。日本戰後的俗諺稱變得強韌的是「絲襪與女人」，但這並不能單純還原與解釋真杉靜枝作品戰後的變化。觀察從戰前到戰後真杉靜枝的書寫主題，便會發現語言、人種、文化的混種性要素，是其作品一貫的重要特徵。而這與其殖

- 18 從漫長的戰爭以及壓抑獲得解放，戰後新民主主義改革為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帶來的變化，營造出這時期女性作家興起書寫自傳小說的風潮。真杉靜枝此時期的自傳小說，應該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參照尾形明子、長谷川啓，〈戰後の出発と女性文学〉刊行にあたって，〈戦後の出発と女性文学〉，尾形明子，長谷川啓監修，〈戦後の出発と女性文学〉第九卷（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三），頁二。另，「引揚」意指日本僑民在一九四五年敗戰之後，從日本帝國殖民地或戰爭期日本占領區域撤返日本內地。
- 19 女性作家的「引揚者」書寫，時至今日仍是日本文壇的熱門主題。例如角田光代《樹屋》（文藝春秋，二〇一〇，中文版二〇一二年由聯經出版在台北發行），以及津島佑子《葦舟起飛了》（每日新聞社，二〇一

一），都以女性個人史或家族史觀點，描寫日本敗戰後日人由滿洲引揚返鄉的經驗。

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海島台灣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前，群居於此的族群便絕非單一。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來自日本境內南北各地的人群匯集，殖民地的混種性(hybridity)要素更以語言、人種、文化的多樣化形式呈現²⁰。這樣的台灣殖民地環境生活經驗，對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為何能無違和感地擁抱新君臨者的語言與文化，應該不無關係。也因此，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成為檢視其台灣書寫經驗時不可或缺的對照軸。

即使在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全盛期，真杉靜枝並未受到太多的矚目，先行研究也不多。這與真杉豐富的創作數量、多樣化的書寫主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樣的傾向凸顯出：無論是文壇定位還是書寫主題，在日本文學史及台灣文學史都找不到真杉的容身之處的事實。真杉靜枝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與「殖民地台灣」的元素，及其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這對她文學特質的形成也有極深刻的影響。真杉的文學特質，從其創作初期便可窺見台灣殖民地的「混雜性」特徵，同時也可見於她在殖民地台灣以外的書寫主題。也因此，如果僅鎖定台灣為主題的作品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的定位，不僅容易讓真杉文學的台灣再現陷入後殖民論述中「政治正確」、「公平正義」掛帥的既教條又僵化的結論，也難以具體呈現其作品中自日本帝國統治到帝國崩壞的「殖民地台灣」形象的變化軌跡。如此不僅難以看出「殖民地台灣」在真杉文學的定位，也難以與她書寫的其他主題對照比較。

20 真杉靜枝曾在〈異鄉的語言〉(異郷の言葉)描述，渡台的船上，傳入耳裡的日語混雜著「南腔北調」，象徵日本帝國擴張的幅員與歷史。真杉在此文也詳述久居台灣殖民地者的日語特徵，足見其對帝國內部語言、地緣與位階上下關係的結構與差異的關係觀察敏銳。真杉靜枝，〈異郷の言葉〉，《南方紀行》(ゆまに書房，二〇〇〇(一九四一))，頁一四二—一五三。

真杉靜枝的先行研究中，日文人獻方面，有李文茹以真杉靜枝、坂口禊子以及山部歌津子²¹三位日本女性作家的殖民地台灣為主題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並主要由性／別的視點進行分析²²。論及真杉靜枝的部分，首先探討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到戰時台灣書寫之間的變化，與自我的「日本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李認為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將台灣喻為「南方墳墓」，讓台灣殖民地成為家父長暴力的隱喻。此外，李以性／別的問題意識出發，以「霧社事件」為主軸，針對真杉靜枝以及中村地平兩人的台灣原住民女性書寫，比較二人視線呈現的台灣形象差異。以真杉靜枝配合國策以〈沙韻之鐘〉為主題所寫成的系列作品為例，李認為〈沙韻之鐘〉為當時國策文學典型的「鎗後小說」，對真杉在小說中並未提及殖民地統治相關的現實問題，評斷真杉為「也是參與殖民地統治的其中一人」²³。最後則集中論述真杉靜枝的戰時文學，言及以一九三九年的台灣訪問為底本的隨筆集

21 山部歌津子的真正身分成謎，垂水千惠曾在二〇一〇年十月七—八日於韓國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帝國日本の移動と東アジアの殖民地文学」國際研討會發表（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野蠻」への共鳴をめぐる——大鹿卓の『野蠻人』・谷崎潤一郎の『武州公秘話』・山部歌津子の『蕃人ライサ』を中心に——），試圖解開山部歌津子的身分之謎。此論文立證假設山部歌津子便是牧師作家沖野岩三郎，推測沖野以女性作家的筆名山部歌津子，創作了《蕃人ライサ》（一九三二），是一部在「霧社事件」發生隔年出版的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小說。

22 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殖民地支配——一九三〇—一九四五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二〇〇五，名古屋大學大学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此論文針對真杉靜枝分析的部分有三章。其中第一章及第三章前後發表於《日本台湾学会報》四号（二〇〇三）以及六号（二〇〇五），此不另行討論。〈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十二號（二〇〇八年六月），同樣譯自上述論文第六章，此亦不再重複討論。

23 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殖民地支配——一九三〇—一九四五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頁七

《無謂的振翅》(甲斐なき羽撃き)中對台灣的印象記，包括對台灣藝旦的視線，以及以真杉的妹妹為藍本所描寫的戰時未亡人以及戰時的兒童文學。李將這些作品整體歸類為配合「國策文學」以及動員戰爭的宣傳文學，並將真杉靜枝視為「自動自發地參與殖民地統治」女性文人的一例，認為其台灣書寫以及表象是「殖民地統治與戰爭協力二重暴力的產物」²⁴。李對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到戰時的一九四〇年代真杉靜枝的台灣相關作品做了概括介紹，對真杉的台灣書寫進行初步整理，做為基礎研究有一定的貢獻。但對真杉文學的定位，其結論基本上遵循後殖民主義論述中的主流——也就是「政治正確」的詮釋。特別是，李以真杉靜枝戰時的台灣書寫為例，直指其「潛在著隱蔽了殖民地統治、參與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爭、讓他國女性成為侵略戰爭的犧牲者的三重構造」²⁵。無可否認地，這樣的結論主要針對她積極的戰爭協力態度而發。對殖民地書寫以及國策文學的斷罪，固然符合清算戰後殖民地負面遺產的「公平正義」原則，但這樣的結論其實可謂與各國戰時下所共有的具「普遍性」的文學現象相同，難以看出真杉靜枝文學的真正特徵，以及其文學作品所牽涉的創作風格與美學問題。此外，李的論文立基於後殖民立場，限定戰前的台灣書寫作品為其分析對象，檢視真杉靜枝創作的「台灣再現」，但也使得當中呈現的台灣書寫問題並不全面。同時，正因為李將台灣題材單獨抽離了真杉同時期的其他作品，反而造成定位真杉文學的台灣書寫的首點。

(續)

一。

24 同前註，頁一二六。

25 同前註，頁一三二。

另外，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²⁶的論點基本上立足於為真杉復權，同時呼籲真杉靜枝選集或全集出版的必要性，以便能進一步進行真杉靜枝的研究。在〈讀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對本島人與台灣話的愛〉（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中針對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真杉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中的女主人公木村花子為例，主張真杉與當時典型的殖民者立場迥異，指出真杉對於被殖民者是懷有愛情以及同理心。但此論文由於並未掌握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時空背景，其主要基調是重新探討真杉文學中「人道主義」立場的可能性，企圖為真杉靜枝復權與辯護。高良對於日本近代文學對此位女作家一直以來的忽視與抹殺，所企圖喚起的問題意識應是最重要的貢獻。

綜觀真杉靜枝所處的戰前日本文壇，近代以來東京與地方的文學位階與上下關係原本便歷歷分明，女性作家更是長期處於性／別（gender）的劣勢。在這樣的文學系譜下，如真杉這樣成長於殖民地而企圖立足於日本中央文壇的女性作家，其所能被容許的空間則更有限。在這樣狀況下，要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更非易事。從側面以觀，戰爭時期成為真杉靜枝創作的豐產期的事實，或許能一窺端倪。就真杉靜枝戰爭時期的「國策文學」作品看來，創作的數量極豐，單行本便有《囑咐》（ことづけ）以及《南方紀行》、《返鄉休憩三日間》（帰休三日間）與《母與妻》（母と妻）等。而以台灣為主

26 高良留美子的真杉研究論文計有三篇。包括〈視角とアンテナ 真杉靜枝が書いた台湾—陰影のあるエッセイ〉，《殖民地文化研究》第四号（二〇〇五）、〈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殖民地文化研究》第五号（二〇〇六）以及〈真杉靜枝と台湾経験〉，《社会学》二一九号（二〇〇九）。

另外，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²⁶的論點基本上立足於為真杉復權，同時呼籲真杉靜枝選集或全集出版的必要性，以便能進一步進行真杉靜枝的研究。在〈讀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對本島人與台灣話的愛〉（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中針對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真杉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中的女主人公木村花子為例，主張真杉與當時典型的殖民者立場迥異，指出真杉對於被殖民者是懷有愛情以及同理心。但此論文由於並未掌握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時空背景，其主要基調是重新探討真杉文學中「人道主義」立場的可能性，企圖為真杉靜枝復權與辯護。高良對於日本近代文學對此位女作家一直以來的忽視與抹殺，所企圖喚起的問題意識應是最重要的貢獻。

綜觀真杉靜枝所處的戰前日本文壇，近代以來東京與地方的文學位階與上下關係原本便歷歷分明，女性作家更是長期處於性／別（gender）的劣勢。在這樣的文學系譜下，如真杉這樣成長於殖民地而企圖立足於日本中央文壇的女性作家，其所能被容許的空間則更有限。在這樣狀況下，要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更非易事。從側面以觀，戰爭時期成為真杉靜枝創作的豐產期的事實，或許能一窺端倪。就真杉靜枝戰爭時期的「國策文學」作品看來，創作的數量極豐，單行本便有《囑咐》（ことづけ）以及《南方紀行》、《返鄉休憩三日間》（滯休三日間）與《母與妻》（母と妻）等。而以台灣為主

26 高良留美子的真杉研究論文計有三篇。包括〈視角とアンテナ 真杉靜枝が書いた台湾——陰影のあるエッセイ〉，《植民地文化研究》第四号（二〇〇五）、〈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植民地文化研究》第五号（二〇〇六）以及〈真杉靜枝と台湾經驗〉，《社会文学》二九号（二〇〇九）。

題進行創作者，除了小說集《囑咐》以及《南方紀行》之外，尚有隨筆集《無謂的振翅》（一九四〇）等。此處呈現了兩個現象：一是「台灣書寫」成爲眞杉靜枝在日本文壇的專利。第二，眞杉靜枝的戰爭協力的態度無疑是積極的。但這二個現象其實互爲表裡，因爲帶著「他者」異質成分的「台灣殖民地」出身者，無疑必須比起其他「內地者」更賣力宣示對皇國的忠誠。但若檢視眞杉進入文壇之後的思想系譜，便會發現輕率地逕將眞杉定位爲右翼的協力作家仍有商榷的餘地。

眞杉靜枝初登文壇不久，便成爲《女人藝術》的同人。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創刊的《女人藝術》（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二年六月）正逢日本左翼思潮盛行，也是大正自由民主思潮的流行時期，而這樣的時代氛圍也如實地反映於雜誌的內容。《女人藝術》同時也是知名的左翼女性思想家與作家的搖籃，如山川菊榮以及當時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高群逸枝都從《女人藝術》出發。此時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思潮的氛圍對眞杉靜枝的影響，也可從眞杉靜枝的一些作品看出端倪。例如〈理韻・哈韻的山谷〉（一九四二）中由內地來到台灣山地教育原住民的青年教師村西武美，是以一九一一年日本大逆事件死刑者之一大石誠之助的姪兒西村伊作爲藍本形塑的人物。而戰後以父親眞杉千里爲藍本的「花樟物語」（一九四六—一九四七）系列小說，則透露出對台灣殖民地政策的不滿與批判。²⁷

27 西村伊作從小便過繼給母親西村娘家，七歲時在濃尾地震失去雙親，與弟弟大石真子、么弟大石七部同父親的么弟大石誠之助同住。之後誠之助與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堺利彥等創立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西村伊作也積極參與。大石誠之助因大逆事件被捕後，西村伊作曾策劃劫獄，然而未果。大正時期，他因不滿日本當局的學校制度，爲自己的孩子自費所創立的文化學院，成爲大正時期自由主義學風的代表。他也是知名的文化住宅的設計者。參照黑川創，《きれいな風貌 西村伊作伝》（新潮社，二〇一〇）。以西村伊作爲藍本人物的小說分析部分，請參考本書第四章。另，眞杉靜枝戰後對台灣殖民地政策回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緊接著進入全面戰爭時期之後，真杉靜枝也搖身一變成爲戰爭協力的國策文學旗手。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真杉轉而對戰前日本帝國國策——特別是台灣殖民地政策錯誤進行批判，同時擁抱新君臨者美國的文化價值。如果就意識型態的一貫性以及政治立場的觀點觀察真杉靜枝，便能察覺這位女作家可謂依時勢而居，左搖右擺，方向不定。戰後原普羅文學女作家平林泰子曾經評論真杉靜枝的天性是「一流的樂天」，也因此「在戰爭時相當深入軍部的報導部內部」，「戰後相同的，她也深入了與戰時立場完全相反的敵國所派遣的文化部官僚之間」²⁸。這正可佐證上述真杉靜枝從戰前到戰後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的變化。真杉靜枝戰前至戰後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幾經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成爲她的文學特徵，也反映在她所選擇的書寫題材。安·蘿拉·史多拉(Ann Laura Stoler)曾經就荷蘭、法國以及英國的帝國文化以及身處此間殖民地的帝國女性之間的關係，歸納出彼此的幾個相似點：「殖民地的女性，從屬於殖民地階層秩序的同時，也因應其身分成爲帝國的旗手，也因此有著與男性非常不同的族群優越性以及社會差異的分斷。也因爲這樣的原因，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來到殖民地大多數的歐洲女性都面臨了來自她們家庭內部、經濟的抉擇以及政治抉擇的束縛」²⁹。對照真杉靜枝的生平與創作，便會發現安·蘿拉·史多拉的這段

(續)

顧時，主要針對西來庵事件的批判，令人聯想真杉或許受武者小路實篤的影響。武者小路實篤早於一九一六年在西來庵事件發生時，便以隨筆與戲曲做出批判。參照本書第二章。

28 平林たい子，〈真杉靜枝さんと私〉，《別冊 文芸春秋》四八号（一九五五年十月），頁六四。

29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California: U.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41-42. 或參照アン・ローラ・ストローラ著・永瀨康之等譯，《肉体的知識と帝国の権力》（以文社，二〇一〇），頁五四。

論述正可適切地詮釋殖民地台灣與真杉靜枝的關係。如果就真杉靜枝所經歷的人種位階的變化以及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社會差異的視點切入，可適切地解讀這位處於性／別（男／女）與階級（上流階級的「內地」日本人與殖民地出身的中下階層日本人）夾縫中的女作家其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也能更適切地觀察她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的——包括殖民地台灣——在各階段所呈現的不同面貌。

觀察真杉靜枝一九三〇年代後期至一九五〇年代作品，包括台灣書寫，每一時期的作品其實都有相通的主題。目前可歸納出其書寫包含傳記（私小說）書寫、越境者問題、性／別問題、人種、語言混種以及身分認同等問題。本書將以這些主題為中心，檢視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從戰前到戰後產生的變化，以及其殖民地台灣書寫如何從帝國邊緣反照帝國核心。此外，也將透過真杉橫跨二個帝國——從日帝到美帝——之間的書寫，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為何在日本文學以及台灣文學二個「國民文學」的邊緣游移，而國策文學對帝國統治貌似拳拳服膺，但其中的雜音不僅如影隨形，又難以收編與消音。

本書的構成分三部分，以三個主軸為中心展開。第一部『私』小說與『私小說』書寫』首先討論真杉靜枝戰後書寫的傳記小說。這一部主要從真杉靜枝的「傳記小說」以及「私小說」形式的作品出發，梳理真杉靜枝「私小說」中的台灣記號如何與其出生及家族命運緊密連結，以及其「傳記小說」中台灣記號反覆的意義。另外，也對真杉靜枝與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迄今為止僅圍繞著「情事關係」而被討論的三人，探討三人的「台灣書寫」。同時將聚焦於三人的「殖民地台灣」書寫主題，重新從文學立場，解讀三人之間的「文學」與殖民地台灣的關係。第二部「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主要以共時性的橫向觀點綜觀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對其中出現的「非典型」國策文學特徵及其戰爭時期台灣殖民地書寫二者之間的生成關係進行探討。另外，也以真杉靜枝

的「沙韻之鐘」翻案作品（理韻・哈韻的山谷）（リヨン・ハヨンの壑）、（囑咐）（ことづけ）為分析的對象，探討這些文本當中所蘊含解構此時期純情愛國少女「沙韻之鐘」神話的可能性。第二部最後以收錄於《囑咐》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的文本為中心進行討論，對於〈南方的語言〉的人物造型以及人物關係，與日本領台以來的語言政策以及成為同化政策一環的「台日結婚」問題二者的關聯性進行探究。文本中所描寫的「國語普及」與「同化運動」，不僅反映了當時台灣處於皇民化運動盛行、積極推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的時代背景，也呈現真杉靜枝的語言以及身分認同的曖昧與混雜性。安·蘿拉·史多拉主張性／別與帝國研究之所以具說服力，便是因為因為性／別與帝國研究當中包含了殖民地主義被性／別化的符號如何轉嫁成為人種主義的符碼論述，同時解明了「在性／別被規制，性受到監視以及人種被管理，在這當中，殖民地國家重要的象徵才能確保」³⁰的帝國殖民主義的結構。而這樣的結構，也可見於日本的台灣殖民地政策。以真杉靜枝的「沙韻之鐘」翻案系列作品以及〈南方的語言〉為例，其對於帝國在性／別、人種以及語言之間的力學關係的操作以及難以自圓其說的破綻，都有揭露形式的呈現。第三部「帝國與帝國之間」，則主要以戰前至戰後過渡期間的書寫為分析對象。這一部首先以真杉的「家族史」書寫為中心，主要探討日本敗戰後，真杉千里一家被迫「自台灣「引揚」³¹的經過為藍本的作品群。真杉靜枝以父親千里的日記為藍本，透過殖民地台灣少女

30 アン・ローラ・ストラー著、永渕康之等譯，《肉体の知識と帝国の権力》（以文社，二〇一〇），頁二五七。

31 「引揚」意指日本僑民在一九四五年敗戰之後，從日本帝國殖民地或戰爭期日本占領區域撤返日本內地。真杉靜枝的「台灣引揚」相關作品，請參照本書第七章。

時期的「八重」（眞杉靜枝）以及「左門治」（父親千里）相互交錯的視點，回溯戰前日本移民在殖民地台灣的家族史。同時這也可視為從日本帝國邊緣者視點出發的家／國族史小說。此部的最後則聚焦於殖民地台灣「引揚者書寫」——這是前述「家族史」書寫的延伸。其中探討的〈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實質上寫作視點已經由「殖民者」轉為「被殖民者」。這群自帝國邊緣返回內地的「引揚者」，凝視崩壞的日本帝國，並迎接新君主亞美利堅帝國。戰後接管日本的新君臨者美國，挾新民主主義的改革之名，以美國中心的語言、文化價值入主戰後的日本。而帝國與殖民地的統治者／隸屬者之間的權力失衡問題，再次地赤裸裸的以性／別的不平等以及統治暴力的揭露，進行最直接的呈現。從殖民地台灣到美國占領下的日本，眞杉靜枝再次反覆書寫這個主題。無論是「台灣引揚者」書寫的〈思念的那人〉，到G H Q占領時期的雜誌《鏡》、還是以自己的訪美經驗在晚年所寫下的〈美國的十字架〉（アメリカの十字架）與〈燃燒的雪〉（燃ゆる雪），都透過女性視點凝視美國占領後所留下的日本敗北傷痕，同時返照戰前日本帝國的榮景與戰敗後的破敗身影。